

革命史資料

20



平
今
史
全
科



20

革命史資料

20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
文史资料委员会
《革命史资料》编辑部编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一九九二·北京

责任编辑：郭丽卿

革命史资料

20

《革命史资料》编辑部编
(限国内发行)

*

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
(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)
新华书店经 销
北京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
北窑上装订厂装订

*

1991年11月第一版·1991年11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毫米1/32 印张：11 字数：250千字

印数：1→2000 册

ISBN7—5034—0522—8/K·328

定价：4.90元

敬 告 读 者

《革命史资料》丛书自1981年创办至今，已历十度春秋，在各级领导、各界老同志的帮助下，得以顺利出版发行。作为正史的拾遗补缺，我们为中共党史的各个方面，特别是统一战线工作历史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史料，受到史学界的重视。鉴于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和中共党史部门的分工，今后我们不再出版《革命史资料》。在此，谨对广大读者和所有帮助《革命史资料》的人致以诚挚的感谢。

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
中国文史出版社 《革命史资料》编辑部

1991年7月

• 1 •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王 英 | 周恩来与东北军工作委员会 | (1) |
| 张梓桢 | 一一五师瓦解敌军的片断回忆 | (16) |
| 艾伯良 | 在石友三军队的兵运工作 | (24) |
| 黄思沛 | 在国民党第五路军中做秘密工作 | (30) |
| 林 青 | 地下通信十三年 | (48) |
| 戴泽坤 | 国共合办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 | (67) |
| 张仁山
吴仰光 | 中央军校北平分校的革命活动 | (75) |
| 凌 山 | 忆秋斯 | (81) |
| 宦 乡 | 挚友雪峰 | (116) |
| 杨 凡 | 与郭沫若在日本的交往 | (122) |
| 王建东 | 苏北根据地的盐务工作 | (142) |
| 江泽民 | 从莫斯科汽车厂到长春第一汽车厂 | (150) |
| 王 屏 | 抗战胜利初期的鞍山公安局 | (164) |

艾新友	廖承志在集中营里.....	(176)
谭汤池	马家洲集中营的由来与狱中斗争.....	(186)
戴觉敏	怀念我的妹妹戴醒群.....	(203)
文正一	朝鲜义勇军.....	(209)
陈静波	东北战地服务团始末.....	(223)
徐立平	敌后《抗战报》.....	(250)
管佑民 冯廷雄	又一个方面军——当年的《新华日报》...	(258)
丁 波	“中艺”在曼谷.....	(282)
陈锐霆	东淝河战场反内战起义.....	(296)
王德全 等四人	解放前的西康反蒋地下武装.....	(329)

周恩来与东北军工作委员会

王 英

决定争取东北军

1935年10月，红军长征到达陕甘苏区。12月，党中央政治局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号召全国人民不分党派不分阶层，团结起来一致抗日。但是国民党政府不理睬共同抗日的号召，反而将东北军调驻陕西，准备围剿红军。党中央为了争取东北军共同抗日，专门组织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。这个委员会分三个地区成立，即东线（陕北）工委，南线（陕甘）工委，西线（甘肃）工委。我被调入东线工委工作。东线工委驻安塞县旧城里，这里只有二十几户人家。工委就在一个门向西的院子里，院中有瓦房和石砌的窑洞。东线工委书记叶剑英，委员有马文瑞、李仲英、边章五、郭洪涛和我，下辖安塞、延安两个县工委会。延安工委书记杨成森，委员刘英永、曹夫等，机关驻延安冯府川，下辖念庄办事处。安塞工委书记马文瑞，马调离后由我担任书记。

我是1936年6月调入工委的。调前我在中央党校任教员，党校驻保安县顺宁川任家坪和阎家沟。一天，校部通知我，中央组织部调我去工作。我马上将自己仅有的两件旧衣、鞋和笔记本等收

收拾好，带上介绍信，愉快地和同志们握手告别，踏上新的征途。

我沿着河川蜿蜒数十里的羊肠小道急速行进，当我到达党中央驻地保安县城，已是汗流浃背。当时，保安县城几经战争，房残壁断，窑破街乱，满眼荆棘丛生，全城只有百十户人家。我找到中央组织部，一位干部处长为我安排了住处。次日，组织部长罗迈（李维汉）和我谈话，他说：“你过去做过白区工作，现在准备派你去东北军工作，你有意见没有？”我说服从组织分配。罗向那位处长说：“你把王英同志引去见周副主席，具体工作请他确定。”

周副主席所住的窑洞，墙壁被烟熏得乌黑，光线很暗，墙上挂着几幅军用地图，图上插着许多红白小旗，标示着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。我被引到后，那位处长对周副主席介绍说，这是党校来的王英。我向周副主席敬礼，他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。周副主席身穿一套普通灰军衣，留着又长又黑的胡须，面容清雅，步履潇洒，不由我肃然起敬，心中有点紧张。周副主席似乎看出了，面带笑容问我：“你是在地下参加共产党的吗？”

我站起来回答：“我是1931年在白军参加党的。”

周副主席又问：“你在陕甘省委还做过东北军的工作吗？”

“当时我是陕甘省抗日救国会主任。因工作需要，省委派我以红29军（军长肖劲光）参谋长的职务，秘密去郿县和东北军67军王以哲部107师刘翰东师长谈判，在那里住了短时间，经过艰苦工作，最后才订立互不侵犯、互相通商密约。”

周副主席微笑着说：“现在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成立，叶参谋长（叶剑英）任书记，那里需要干部，准备派你去作巡视员。这工作比较艰苦，你愿意去吗？”

我毫不犹豫地回答：“没意见。做白区工作困难些，但我一定尽

力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。”

“这就很好，党员对党的事业就应有这样的态度。”周副主席讲了鼓励我的话，就亲自给叶剑英书记写信，介绍我去工作。他把信写好，站起来交给我。我接过信，表示马上动身去工委。将要离开时，周副主席转身对那位处长说：“让王英同志今天不要走，明天上午中央要开会研究东北军的工作，他参加一下好，先把会议精神带回去，正式文件随后下达。”我同处长行礼辞别后，到组织部办好工作调动手续，回到驻地窑洞。这一晚，我心潮澎湃，难以平静，不由自主地拿出周副主席那封亲笔介绍信，反复看着、想着。

第二天早饭后，我同处长去见周副主席，进窑洞后周副主席说：“咱们参加会议去。你今天要走吗？”我说：“会如果结束早，我还想赶些路。”周副主席说：“看会议开的情况，不能走就等到明天走吧。”接着，我们一同到了会场，同志们都不约而同地站起来，周副主席挥手致意让大家坐下，然后说：“这是王英同志，他要到东北军工委去工作，让他参加会议，把会议精神带给工委去。”同志们听到我的名字，都很惊讶，周副主席解释说：“这是咱们的王英同志，不是内蒙古德王那里的。”同志们都哗然笑了。

会议由周副主席主持，他首先说：“今天把东北军工作研究一下，先由××同志作汇报，然后提出问题讨论，今天会这样开，大家有没有意见？”到会同志都说没有。这时××同志就把东北军在陕甘宁边区的布防情况，及他们和西北军杨虎城、井岳秀部队摩擦的情况作了说明，然后，就工委工作作如下汇报：

我方在陕北鄜县、甘泉一带通过释放回去的东北军107师619团团长高福源和该师一个副营长（该副营长被我红78师杨森师长

在富县羊泉塬俘获），已促使驻鄜县的107师刘翰东师长和我们建立了互不侵犯、互通有无的密约。在延安清涧一带工作开展迅速。城内已找到原有老关系，建立了地下情报组织。对哥老会，也已帮助他们开过几次“山堂会”，把大部分大爷团结了起来；他们积极支持我们的抗日政策，给我们送情报，和地方团队交朋友。今后的工作是，对现有的东北军工委及所有各地办事处必须加强领导，充实骨干力量，建立白区秘密抗日救国会，对哥老会工作，工委要派得力同志去领导。

会上，同志们对工委过去的工作做了全面的评价，对今后的工作也提出了宝贵意见。最后周副主席说：“东北军工委这一时期的工作很有成绩，这是毛主席、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威力，也是党的组织发挥了领导作用。据最近的情报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正在发展，各地学生纷纷游行示威，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，一致对外。各民主党派呼吁停止内战，一致抗日，声浪日益高涨。东北军内部绝大部分人想打回老家去，不但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因为围剿苏区多次失败，表现动摇，畏缩不前，就是高级军官也缺乏信心。这对我们是极有利的形势，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时机，争取全国人民和更多的国民党军队倾向我们，以瓦解敌军，孤立敌人，才能真正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。为适应这一形势，我们必须加强东北军工作委员会，由中央党校抽出一批强有力的干部充实进去，把工委办事处再增加一些人，具体数目你们研究。”

接着，周副主席回头要求中央联络部部长李克农和工委密切配合，之后又继续说：“对哥老会，我们要派得力党员干部参加进去，争取领导权，他们的‘大爷’、‘坐山大爷’、‘龙头大爷’都可

以当，这有利于我们开展工作。对边境区设立集市，我们多卖猪、羊肉、鸡蛋、蔬菜，并少量出卖粮食来换取必需品，如棉花、布匹、电池、火柴等。总之，党中央对东北军工作很重视，要求党、政、军保卫部门和贸易机关，都要在东北军工委统一领导下工作。在对敌斗争中，要注意调查，了解情况，正确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，绝不能左右摇摆，疏忽大意。”

周副主席讲话时，我坐在墙角凳子上认真作了笔记。当会议结束时，周副主席对我说：“王英同志，你和×秘书把记录核对一下，然后带回去，让他们先按这个精神办。”他又侧身向一位领导同志说：“有给东北军工委带的东西，也叫王英同志带去。”我向周副主席敬了礼，就出了会场。

把重点放在延安

下午我冒着小雨出发了。去安塞，人地生疏，只好按图索骥。一路上翻山越岭，经过两天时间到达安塞。

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机关驻在安塞旧城下面河滩里一个村庄。我见到叶剑英书记，送上周副主席的介绍信。叶书记说：“正需要干部，你来得很好。”按照叶书记的安排，当天晚上召开工委会议。参加会的有马文瑞、边章五、李仲英等同志，叶书记主持会议。我按中央东北军工作会议记录，作了汇报，并说明周副主席叫先按这个精神办。在会上委员们按照这个精神，对工作做了充分研究。第二天，叶书记还和我谈了我今后的具体工作和应注意的问题。

到工委以后，我经常到下面工委及办事处巡视工作，传达指

示，布置任务，研究敌伪人员情况；开辟边境集市，宣传党的商业政策，鼓励赤白两区群众到市场贸易，指定专人管理市场；发动群众，打击敌特反动分子；对东北军宣传“中国人不打中国人”、“打回老家去”等口号。经过几个月工作，取得较好成绩，多次得到叶书记嘉许。后经叶书记提议，我成为工委委员。

中共中央鉴于当时形势，在1936年9月改组了东北军工委员会，叶书记及其他委员调离，中央委任我为安塞东北军工委员会书记，兼中共联络部（李克农部长所辖）延安联络站站长，下辖裴庄等几个办事处。安塞县委书记李子厚、保安科长惠晋和贸易局长刘子谋、张耀宇为工委委员。新工委成立后，经研究，我们把工作重点转到延安。延安城区当时驻有东北军67军一部（军长王以哲）、安塞民团、延安民团、剿共义勇军、保安队。据侦察获悉，安塞民团是我军解放安塞县城后逃到延安的，驻清凉山，团长薛生华，官兵400余人。延安民团团长李翰华，只有二三百人。县府保安队100余人。他们经常袭扰苏区，抢劫群众，捕杀我革命同志。

根据延安城当时的复杂情况和敌我态势，为了统一步调，开展工作，工委会规定按期召开会议，研究情况，并对统战工作作了系统安排。

一、对延安城内驻军作详细调查，恢复原城内中共党员关系，查清敌军部队番号、编制、武器装备、主官姓名、籍贯、社会关系等，并登记注册，以便争取。经过调查了解，到1928年，在延安城内，在学校的工友中，党员有姚安吉、马耀先，学生中党员有王世泰、孙定一等30多名。当年4月，因打基督教堂，中共党组织被敌破坏，现只有姚安吉在延安城内居住。我们和他接上关系，并布置他去洛川、甘泉、鄜县等地了解东北军和民团情况。

姚即以做小生意为掩护，积极活动。回延安后，仍以小生意人为名宣传抗日救国，并动员白区商人及市民到新设边境集市做生意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，姚安吉工作很有成绩，安塞工委恢复了姚的党籍。为了保密，姚和我属单线联系。由刘子谋帮助姚在延安开设烟酒铺，字号名“天德号”，进行秘密工作。

二、根据中央1936年7月16日对哥老会工作的指示，动员哥老会的大爷争取民团。据了解，延安城内有哥老会的大爷周渔山、解虎，城外有篮长有（住杜甫川）。这些人都和安塞、延安民团中的哥老会有关系，并有一定威望。我们马上邀请晤谈，晓以党中央对哥老会的政策和期望，以及团结一致，抗日救国的重大意义。并提出给大爷们以经济资助，动员他们到延安城对民团做争取工作。他们和安塞民团团长车三娃、驻桥儿沟民团团长唐海燕、延安民团团长曹清俊等经常来往，利用同乡、同会关系，肺腑直言，宣传我党停止内战、团结一致抗日救国的政策，特别给他们讲明，红军不究既往，优待起义官兵，劝他们都给自己留下后路，不要扰害群众等。经过多次耐心说服，这些民团中的几个团长都表示愿意接受我们的劝告，情愿在时机成熟时起义参加红军。这对瓦解延安城敌伪军起了相当大的作用。

三、选择接近敌人的村庄建立集市贸易。借集市活动，促使敌官兵和我们接触。在集市上，我们一方面宣传商业政策，招徕商人参加集市贸易，一方面宣传停止内战、一致抗日的政策，并张贴标语：“中国人不打中国人”，“东北军官兵们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，拯救亲人”。起初因赤白两区对立，来往商人要冒很大危险，故白区商贩和群众赶集者很少。但是经过少数赶集人回去宣传，白区商贩和群众赴集市交易的逐步增多。民团和东北军的官

兵也三五成群来集市观光。这些官兵开始还穿便衣，试探性地来市场看看，后来就公开穿军装赴市场。市场贸易日益繁荣，宣传工作也收到一定成效。东北军的官兵和民团官兵看到标语很受感动。

工委会还利用集市贸易派人伪装小商贩，和东北军、民团做生意，热情接待，廉价出售商品。有时还向他们赠送一些土产，和他们逐渐结为朋友，请他们来家作客，从他们口中了解情况。工委会负责同志也借机和在延安的工作人员（如姚安吉）接头。因为白区群众来往集市少，我们还利用可靠亲友关系把党的宣传品带到延安城附近去散发，使白区的广大人民了解党的抗日救国政策。通过市场活动，不仅打破了国民党对苏区的经济封锁，而且争取了东北军很多官兵，接受我党停战议和、抗日救国的政策，并为瓦解反动民团的力量，争取其部分团队起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

到1936年12月，除67军的部分高级军官尚在犹豫徘徊外，延安城区所驻敌军和民团官兵大部分倾向我们，并有少数人已和我们建立关系。地方民团有两个中队约定按我们要求届时起义，四五个中队还在观望，只有县长高锦尚所率保安队和延安民团不听劝告，始终与我为敌。

1936年8月，高锦尚率延安民团300多人，由延安城出发沿安塞川而上，企图偷袭我东线东北军工作委员会，幸被工委张耀宇去边境巡视工作中发现。我警卫团一营闻讯即登南山阻击敌军，叶剑英书记亲自指挥。当从望远镜观察发现敌军混乱时，即命令我军反击，经过几个小时激烈战斗，将敌击溃，我军伤亡三人。

同年10月一天拂晓，延安民团团长李翰华、安塞民团团长薛生华和县府组织200余人，突然袭击我安塞工委会所辖之裴庄办事处。这个办事处距延安20里，属苏区管辖，驻有我乡政府。敌人先到川口，将办事处主任吴章明捉去，继向裴庄扑来。敌人一部分到裴庄山上，而大部分将裴庄包围。捕去该庄办事处工作人员李三棋、郭三谋，安塞县宣传部长封英辉、管伙食的周同志等，并捉去乡政府管粮食的周志华。敌军在裴庄大肆抢劫群众的粮食和财物，于当日下午4时撤离，并将以上被捉的六人押至延安。除周志华被保释放外，其余五人均被敌军杀害于延安城外文庙滩。

鉴于高锦尚所辖保安队及民团两次偷袭工委，杀害干部，我们除加强警戒预防袭击外，还对敌军大力进行争取瓦解工作。

西安事变后

1936年12月12日，西安爆发了“双十二”事变。事件发生后两三天，延安城内外的正规军全部撤走，只留下安塞、延安两县民团和保安队共约千余人。这是从敌人内部得到的消息，我们非常高兴，认为解放延安的条件已经成熟，工委会立即召开会议，研究了解放延安的具体方案。

15日早上，一个通信员飞马送来周恩来副主席给我的信，信中简要说明张、杨将军已扣押蒋介石，请中共代表去西安商谈国事。要我们立即了解延安城内及飞机场的情况，做好他去西安的准备工作，并说次日下午即可能到达工委。接着中央军委派黄春圃（即江华）来工委具体布置。我们立即召开工委会，研究护送首长去西安的保卫工作。会议决定派专人进城了解敌情，要求于

当天必须把情况查清，并散布红军主力马上就要开来的消息；工委机关及时迁到距延安城约20里的一个村办公，并加强警戒，以防不测；布置游击队、赤卫队登上延安城周围山头，白天挖工事，晚上放火，在安塞川村庄号房子，张贴欢迎红军主力的大标语，以示我军即将解放延安，使敌人更加惊慌不安。

16日西北风呼啸而起，大雪纷飞，温度骤降，滴水成冰。下午我们派出骑兵通信员到安塞上川去和周副主席联络。通信员回来报告，周副主席晚上可到工委临时办公处。我们急速安排食宿，并整理出敌我态势材料准备汇报。

下午，瞭望哨报告周副主席来了，距我工委驻地四五里路时，我即刻骑马去迎接。周副主席和随行的几位首长都骑马缓行，我迎上去敬了个礼，问周副主席身体好。周副主席微笑着向几位首长介绍：“这是王英同志。”随后，我跟在周副主席马后缓行。他问我飞机场敌军警卫有多少？延安城内有多少白军？我说：“城里白军撤走了，只有1000多民团，详细情况我们画有敌情图表。”

我接周副主席一行到工委办公处吃完晚饭，就向周副主席汇报，叶剑英参谋长和罗瑞卿、博古等诸位首长也在座。我在桌上摊开敌军分布图，汇报说，延安城内有安塞、延安两县民团，分布情况是，延安民团李汉芳人数较多，守东门及南山城墙；安塞薛生华民团守北城门。南山城墙修有两处母碉堡、四处子碉堡，城内主要街巷及城墙上筑有隐蔽地堡30多个。城外敌军已全部撤离，山头工事尚未拆除，清凉山有敌军驻守。城内有一修械所，一个弹药库，粮仓所存粮食可供敌军两个月消耗。飞机场仅有少數地勤人员，在山头和飞机场设有五处岗哨。我们已和民团两个